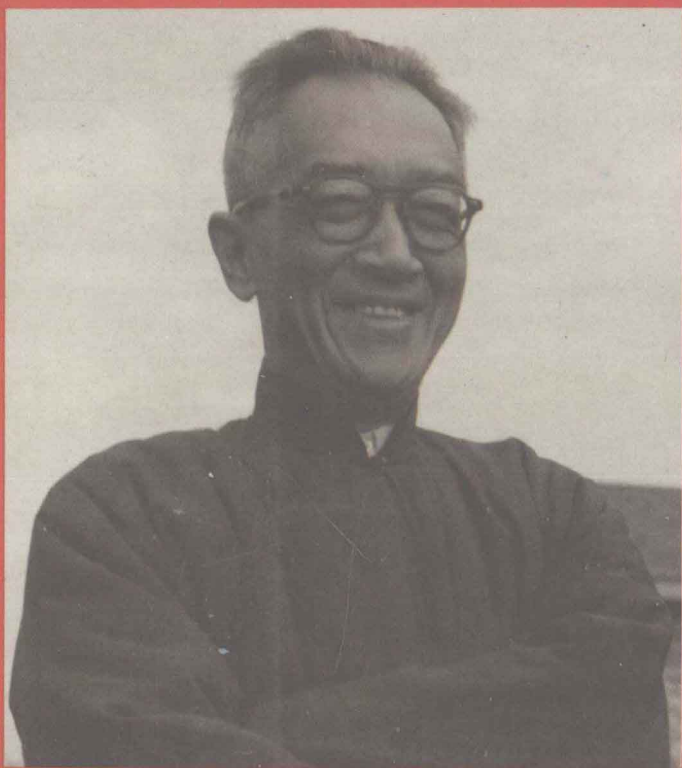


胡適作品集 9

# 我們的政治主張

胡適文存 第二集第三卷



胡適



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  
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

胡適作品集 9 我們的政治主張

# 胡適文存

第二集第三卷

胡適作品集⑨

## 我們的政治主張（胡適文存／第二集・第三卷）

---

作者／胡適

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

發行人／王榮文

出版者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92-3707（代表號）

總經銷／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

郵撥／0103854-0 電話／306-6842

---

法律顧問／

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／(05)227-3193

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／721-9391

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10樓2室 電話／394-3393

---

內文印刷／

松明印刷事業有限公司・板橋市仁化街84號 電話／253-3081

封面印製／

萬興印刷製版公司・中和市景新街140-4號1樓 電話／249-1836

1986年3月25日 遠流一版

---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**售價100元**（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）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---

香港出版者／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 H.K.\$25.

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

香港經銷商／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／5-293283

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

藝文圖書公司 電話／3-805705

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

### 影響胡適少年時期的〈時報〉

胡適在十四歲到十九歲之間，在上海每日閱讀〈時報〉，深受影響。胡適說，當年的〈時報〉有兩大貢獻：一是創立痛快的「短評」，二是開闢帶有文學興趣的「附張」。

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二日 星期一 第...號

# 時報

西曆一千九百十七年七月二日 星期一

上海南北商會選舉各業領袖及內會各  
議定等於昨日下午四時齊集總商會議  
事廳開緊急會議公決反對復辟電京南  
京高副總統進行維持共和國體實力堅  
持以慰衆望而安民心  
昨日江蘇省教育會上海縣教育會午後  
均開會議反對復辟並擬聯合南北商會  
定於本月六日起至八號止高掛共和國  
旗三天以爲表示擁護共和之決心  
本埠自復辟之事實現以來人心憤激茲  
聞孫中山先生以奔走革命數十年共  
告成六略今一旦破壞且有種族關係  
視之下憤不欲生昨特就環龍路本字  
集各要人各同志會議誓不與共天日  
盡釋穴犁庭計畫並聞孫先生會議之後  
不覺放聲痛哭

### 黃宗羲論學生運動

胡適談五四運動時曾贊成學生干預政治，很多人批評他「做大學教授不應該這樣鼓勵學生的運動」。結果，胡適從黃宗羲的〈明夷待訪錄〉找出理論根據，說明這是「三代遺風」。



### 蔡元培是消極嗎？

民國十二年初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抗議北洋政府司法不獨立而辭職，北京〈晨報〉稱此事為「蔡元培之不合作主義」。陳獨秀認為蔡氏消極，胡適則為文支持蔡元培的抗議精神。

---



## 胡適的歧路

胡適的專業是思想與文學，但他又愛談政治。他在〈我的歧路〉一文中，自述他走上政論的由來：胡適說，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，他接辦〈每週評論〉，才「不能不談政治」。

每週評論

**▲代撰所**

only  
35

理於上的樓體  
北京中華書局

上海華英書局

高電  
壓

少年中國學會消息 八月十五日出版報載大洋一角各大書莊代售

▲馬列主義與主義

肉之先聲。或生車馬之味，物之始也。牛羊肉  
費與的相類而文、題只是各別定其新陳少  
；雞、一發覺也、一香潔潔、及于和也。可也  
宜的、暖又和矣、身的是我們對食會同與、  
得把把這一案案、獨是、獨足。

一、「有教無類」：「有教」指「有教育」，「無類」指「不分貴賤貧富」。孔子認為教育不應有階級之分，不論貧富貴賤，人人都應有受教育之機會。孔子在《論語·衛靈公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有教無類。』」

二、「因材施教」：指根據學生的不同特點，給予不同的教育。孔子在《論語·先進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avar 求也退，故君子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君子退之。』」

三、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」：指學習與思考相結合。孔子在《論語·學而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』」

四、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」：指知識、仁德、勇氣是克服困難的三要素。孔子在《論語·子罕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』」

五、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」：指要虛心向他人學習。孔子在《論語·述而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』」

六、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：指要推己及人，成人之美。孔子在《論語·雍也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』」

七、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：指要克制自己的私欲，恢復禮制。孔子在《論語·顏淵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克己復禮為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』」

八、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：指要追求真理，不惜犧牲生命。孔子在《論語·述而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」

九、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：指時間如流水般流逝，不可挽留。孔子在《論語·子罕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』」

十、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：指天不言，但萬物自然生長。孔子在《論語·陽貨》中說：「子曰：『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』」

[illegible][illegible][illegible]

## 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出版前言

王榮文

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，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「價值重估」(Transvaluation of values)工作；也就是說，在胡先生「恩怨將盡之時」，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，就胡適論胡適，「還他一個本來面目」的時候。

近幾年，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，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。例如：唐德剛先生著、譯的《胡適雜憶》《胡適口述自傳》二書，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；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《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》已經出版了；余英時先生的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」也開啓了「爲胡適定位」的有意義的討論。即使在海峽對岸，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「熱鬧」早已退散了。這幾年，他們重新整理出版《胡適的日記》《胡適書信集》，並編纂《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》，這些行動，多少都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。

另一方面，胡適之先生的「俗世聲名」正迅速地沉澱，他自己的確是已從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「歷史命題」。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，卻也有益於「胡適定位」的討



論；新起的研究者，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。余英時先生在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」文中就說：「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，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『譽』或『謗』的傾向。」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。

正是因為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「歷史命題」，「重新看胡適」就變得可能了。

遠流版的《胡適作品集》，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個起步工作。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，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；另一方面，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，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，希望有助於《胡適全集》的早日出版。

《胡適作品集》的新版發行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「實用的」現代意義。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「明白曉暢」，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。他在「介紹我自己的思想」一文中說：「我要教人疑而後信，考而後信，有充分證據而後信。」他又說：「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，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，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。」

「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」，即使在今天，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，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。最後，我們對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得以印行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，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。

胡適作品集 9 我們的政治主張

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遠流版《胡適作品集》出版前言     |    |
| 十七年的回顧             | 一  |
| 祝《白話晚報》            | 七  |
| 黃梨洲論學生運動           | 九  |
| 《政治概論》序            | 一三 |
| 「天乎帝乎」序            | 一九 |
| 我們的政治主張            | 二一 |
| 〔附錄〕關於「我們的政治主張」的討論 | 二六 |
| 我的歧路               | 六一 |

〔附錄一〕王伯秋先生來信

六九

〔附錄二〕傅斯發先生來信

七〇

〔附錄三〕答伯秋與傅斯發兩先生

七二

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

七五

〔附錄〕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（陳獨秀）

八二

國際的中國

八九

一個平庸的提議

九五

一年半的回顧

一〇五

與一涵等四位的信

一一五

這一週

一二九

## 十七年的回顧

我於前清光緒三十年的二月間從徽州到上海求那當時所謂「新學」。我進梅溪學堂後不到兩個月，《時報》便出版了。那時正當日俄戰爭初起的時候，全國的人心大震動，但是當時的幾家老報紙仍舊做那長篇的古文論說，仍舊保守那遺傳下來的老格式與老辦法，故不能供給當時的需要。就是那比較稍新的《中外日報》也不能滿足許多人的期望。《時報》應此時勢而產生。他的內容與辦法也確然能够打破上海報界的許多老習慣，能够開闢許多新法門，能够引起許多新興趣。因此《時報》出世之後不久就成了中國智識階級的一個寵兒。幾年之後《時報》與學校幾乎成了不可分離的伴侶了。

我那年只有十四歲，求知的欲望正盛，又頗有一點文學的興趣，因此我當時對於《時報》的感情比對於別報都更好些。我在上海住了六年，幾乎沒有一天不看《時報》的。我記得有一次《時報》徵求報上登的一部小說的全份，似乎是「火裏罪人」，我也是送去應徵的許多人中的一

個。我當時把《時報》上的許多小說詩話筆記長篇的專著都剪下來分黏成小冊子，若有一天的報遺失了，我心裏便不快樂，總想設法把他補起來。

我現在回想當時我們那些少年人何以這樣愛戀《時報》呢？我想有兩個大原因：

第一，《時報》的短評在當日是一種創體，做的人也聚精會神的大膽說話，故能引起許多人的注意，故能在讀者腦筋裏發生有力的影響。我記得《時報》產生的第一年裏有幾件大案子：一件是周生有案，一件是大鬧會審公堂案。《時報》對於這幾件事都有很明決的主張，每日不但有「冷」的短評，有時還有幾個人的簽名短評，同時登出。這種短評在現在已成了日報的常套了，在當時卻是一種文體的革新。用簡短的詞句，用冷雋明利的口吻，幾乎逐句分段，使讀者一目了然，不消費工夫去點句分段，不消費工夫去尋思考索。當日看報人的程度還在幼稚時代，這種明快冷刻的短評正合當時的需要。我還記得當周生有案快結束的時候，我受了《時報》短評的影響，痛恨上海道袁樹勳的喪失國權，曾和兩個同學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。這也可見《時報》當日對於一般少年人的影響之大。這確是《時報》的一大貢獻。我們試看這種短評，在這十七年來，逐漸變成了中國報界的公用文體，這就可見他們的用處與他們的魔力了。

第二，《時報》在當日確能引起一般少年人的文學興趣。中國報紙登載小說大概最早的要算徐家匯的《匯報》。那時我還沒有出世呢。但《匯報》登的小說一大部份後來彙刻為《蘭香館外

史》，都是「聊齋」式的怪異小說，沒有什麼影響。戊戌以後，雜誌裏時有譯著的小說出現，專提倡小說的雜誌也有了幾種，例如《新小說》及《繡像小說》（商務）。日報之中只有《繁華報》（一種「花報」），逐日登載李伯元的小說。那些「大報」好像還不屑做這種事業（這一點我不敢斷定，我那時年紀太小了，看的報又不多，不知《時報》以前的「大報」有沒有登小說的）。那時的幾個大報大概都是很乾燥枯寂的，他們至多不過能做一兩篇合於古文義法的長篇論說罷了。《時報》出世以後每日登載「冷」或「笑」譯著的小說，有時每日有兩種冷血先生的白話小說，在當時譯界中確要算很好。譯筆。他有時自己也做一兩篇短篇小說，如福爾摩斯來華偵探案等，也是中國人做新體短篇小說最早的一段歷史。《時報》登的許多小說之中，《雙淚碑》最風行。但依我看來，還應該推那些白話譯本為最好。這些譯本如《銷金窟》之類，用很暢達的文筆，作很自由的翻譯，在當時最為適用。倘《幾道山恩仇記》（*Count of monte cristo*）全書都能像《銷金窟》（此乃《恩仇記》的一部份）這樣的譯出，這部名著在中國一定也會成了一部「家喻戶曉」的小說了。《時報》當日還有「平等閣詩話」一欄，對於現代詩人的紹介，選擇很精。詩話雖不如小說之風行，也很能引起許多人的文學興趣。我關於現代中國詩的知識差不多都是先從這部詩話裏引起的。

我們可以說《時報》的第二個大貢獻是為中國日報界開闢一種帶文學興趣的「附張」。自從《時報》出世以來，這種文學附張的需要也漸漸的成為日報界公認的了。

這兩件都是比較最大的貢獻。此外如專電及要聞，分別輕重，參用大小字，如專電的加多等等，在當日都是日報界的革新事業，在今日也都成為習慣，不覺得新鮮了。我們若回頭去研究這許多習慣的由來，自不能不承認《時報》在中國日報史上的大功勞。簡單說來，《時報》的貢獻是在十七年前發起了幾件重要的新改革。這幾件新改革因為適合時代的需要，故後來的報紙也不能不儘量採用，就漸漸的變成中國日報不可少的制度了。

我是同《時報》做了六年好朋友的人，庚戌去國以後，雖然不能有從前的親密，但也時常見；現在看見《時報》長大成了一個十七歲的少年，我自然很歡喜。我回想我從前十四歲到十九歲的六年之中——一個人最重要最容易感化的時期——受了《時報》的許多好影響，故很高興的把我少年時對於《時報》的關係寫出來，指出他對於當時讀者和對於中國報界的貢獻，作為《時報》的一段小史，並且表示我感謝他祝賀他的微意。

但是我們當此慶賀的紀念，與其追念過去的成功，遠不如懸想將來的進步。過去成績只應該鼓勵現在的人努力造一個更大的將來，這是「時」字的教訓。倘若過去的光榮只使後來的人增加自滿的心，不再求進步，那就像一個辛苦積錢的人成了家私之後天天捧着元寶玩弄，豈不成了一個守錢虜了嗎？

我們都知道時代是常常變遷的，往往前一時代的需要，到了後一時代便不適用了。《時報》

當日應時勢的需要，爲日報界開了許多法門，但當日所謂「新」的，現在已成舊習慣了，當日所謂「時」的，現在早已過時了。《時報》在當日是報界的先鋒，但十七年來舊報都改新了，新報也出了不少了，當日的先鋒在今日竟同着大隊按步徐行了。大隊今日之趕上先鋒，自然未必不是先鋒的功勞，但做先鋒的人還應該努力向前爭這個「先鋒」的位置。我今年在上海時曾和《時報》的一位先生談話，他說：「日報不當做先鋒，因爲日報是要給大多數人看的。」這位先生也是當日做先鋒的人，這句話未免使我大失望。我以爲日報因爲是給大多數人看的，故最應該做先鋒，故最適宜於做先鋒。何以最適宜呢？因爲日報能普及許多人，又可用「旦旦而伐之」的死工夫，故日報的勢力最難抵抗，最易發生效果。何以最應該呢？因爲日報既是這樣有力的一種社會工具，若不肯做先鋒，若自甘隨着大隊同行，豈不是放棄了一種大責任？豈不是錯過了一個好機會？豈不是辜負了一種大委托嗎？

即如《時報》早年的歷史，便是一個明顯的例。《時報》在當日爲什麼不跟着大家做長篇的古文論說呢？爲什麼要改作短評呢？爲什麼要加添文學的附錄呢？《時報》倡出這種種制度之後，十幾年之中，全國的日報都跟着變了，全國的看報人也不知不覺的變了。那幾十萬的讀者，十幾年來，從沒有一個人出來反對某報某報體例的變更的。這就可見那大多數看報的人雖然不免有點天然的情性，究竟抵不住「旦旦而伐之」的提倡力。假使《申報》今天忽然大變政策，大談社會



主義，難道那看《申報》的人明天就會不看《申報》了嗎？又假使《新聞報》明天忽然大變政策，一律改用白話，難道那看《新聞報》的人後天就會不看《新聞報》了嗎？我可以說：「決不會的」。看報人的守舊性乃是主筆先生的疑心暗鬼。主筆先生自己喪失了「先鋒」的銳氣，故覺得社會上多數人都不願他努力向前。譬如戴綠眼鏡的人看着一切東西都變綠了，如果他要知道荷花是紅的，金子是黃的，他須得把這副綠眼鏡除下來試試看。今天是《時報》新屋落成的紀念，也是他除舊布新的一個轉機，我這個同《時報》一塊長大的小時朋友，對他的祝詞，只是：「《時報》是做個先鋒的，是一個立過大功的先鋒，我希望他不必拋棄了先鋒的地位，我希望他發憤向前努力替社會開先路，正如他在十七年前替中國報界開了許多先路！」